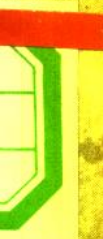


农民的终结

〔法〕H.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农民的终结

〔法〕H.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春光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农民的终结

NONGMIN DE ZHONGJIE

[法] H·孟德拉斯 著

李培林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总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00 册

ISBN 7-5004-0863-3/C·9

定价：4.80 元

译 者 的 话

H·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他长期从事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工作，是欧洲著名的农村社会学专家，著有《农民社会》(1978)、《社会变迁》(1983)等十余种著作。《农民的终结》可以说是孟德拉斯的成名作，最早于1964年问世，很快被誉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杰作。1984年再版时，作者为该书加了跋，认为该书出版后20年的乡村变化证实了他的基本结论和预言。

孟德拉斯的这本力作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作者认为，在今天的法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研究农村的变迁过程，探索全世界一、二十亿农民跨入工业文明社会的途径，这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尽管作者的部分论点今天看来很值得商榷，但作者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刻分析显示了他细微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分析角度。

我国自改革以来，最巨大、最显著的社会变迁发生在农

村。农村的社会结构、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民的职业群体结构这三个方面十余年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弄清这种变迁的动力、过程、机制、结果和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的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笔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之邀译出此书，希望能为从事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借鉴。

译者

1990年5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60705 / 09

乡下人！一个奇特的古词。渔夫、猎人、农夫、牧人，人们现在还能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吗？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他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经常的谈论，人们称之为“农民”。

G·塔德：《未来史片断》，1896年。

目 录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1)
-----	---------------	-------

第一部分：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第一章	变迁的力量和机制	(29)
第二章	土地、劳动和时间	(57)
第三章	家庭和经营	(91)
第四章	一项变革：杂交玉米	(116)

第二部分：农业劳动者及其企业和社会

第五章	企业家及其决策	(157)
第六章	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和状况	(195)
第七章	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	(232)

结 论	可能的未来	(268)
跋	二十年之后	(297)

附 录：	一、参考书目	(336)
	二、人名索引	(350)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马尔萨斯的忧虑首次重新变得如此现实。在所有的国家，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得更快。从全球来看，农业的生产过剩不再会是令人恐惧的了，食品的欠缺变得令人焦虑不安，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农学家们发出报警的呼声。“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农业潜力起初曾使他们产生过幻想。他们曾认为，某些先进的技术就足以使那些方法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增长1倍，有时甚至增长10倍。但R·杜孟作为先驱者之一，首先惊愕地发现，一种技术，尽管十分先进，当它没有被农业劳动者接受和使用时就不会有任何帮助。然而，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在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

对于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社会科学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呢？有客观历史的研究，有经济学家们近来对增长问题

发生的兴趣，有一些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还有社会心理学界关于人们对变化的态度的某些研究，但没有任何综合性的研究，没有任何可以指导执政者的政策和负责人的行动的整体理论。这就很容易理解，当农学家断言“黑非洲起步不好”^①时，社会学家却只是提出质疑：“黑非洲能否起步？”^②这种令人痛心的对话，当会引起正直人的愤慨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的羞愧。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由于受工人阶级的诞生、资本主义企业惊人的效率以及货币构成的唯一手段所迷惑，它们对没有工资、没有企业主、没有货币条件下运转的社会体系失去了兴趣，然而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大多数国家属于这种社会体系，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属于这种社会体系。

只有一些研究农民的专门作者继承着古代和中世纪农学家的伟大传统。但M·多巴瑟、F·诺沙都、A·葛斯林和L·拉沃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往往只是在重复瓦隆、科伦麦尔、塞尔或罗兹埃教士所说过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观察

① 杜孟，1962年。（本书的所有注解都是根据原法文版译出的，这里注明的是参考著作的作者和出版年代，可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根据人名和年代查到书名。下同——译者）

② 梅斯特，1966年。

家，对于农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当古典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设计“工业经济”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对乡村经济作出什么革新。勒普莱^①和他的学派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试图像考察工人家庭那样细致地考察农民家庭，以期把握农民家庭的精髓。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坚持客观性的志向，不被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引入歧途，他们的研究会有新的前景^②。

热衷于调和民法和习惯做法的法学家们，在法理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分析家庭经营，因为家庭经营必须使家庭的需要和经济的强制要求以及农学家的愿望协调一致^③。不管在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的各种不同形式方面，还是在劳动成果的分配方面，乡村契约合同都是如此的丰富多样和精巧细致，表明法学家们对农村的技术与经济实践以及习俗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由公证人和法官运用的、但却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了解的规范学，是观察和认识的成果，它比很多描述性的研究更适合于丰富的社会学构思。

此外，从玛丽-黛莱丝时期的奥地利到斯托雷宾时期的俄国，东欧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都有它们的理论家和空论家。今天，人们读他们的著作仍有收获，特别是如果人们对不发达国家感兴趣的话。然而，人们却很少能从中获得适合于现代社会学的材料。

与此相反，俄国民粹派曾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于现实真正的乡村经济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这种设想仍具有令人惊

① 勒普莱，1879年。

② 勒费布沃，1949年。

③ M·儒齐拉尔，1958年。

奇的现代性。令人痛心的是，如此有希望的智慧之举都被一些政治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这项知识事业本可能恰好避免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很多失误。特别是柴雅诺夫^①，他曾从帝俄时代地方自治会的核算出发，试图建立一种不考虑货币的农民企业制度。他从农民的观点和农场主的观点这两个方面对帝俄的国有体制进行了双重分析，提出了一些调和农业生产要求和现代经济需要的可能方式^②。人们可以想象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苏联农业将会是何种情景。

这些为观察和理解农民所作的孤立的努力都注定要遭到失败。但它们的贡献在于使得自己的时代相信，农业的活动所遵循的是芝诺芬和赫西俄德的箴言：关于主体我们已言尽其词，敏锐的精神应当转向其它领域。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功。然而，这两者都一致否认农民经济社会体系的独特性，试图按照从都市和工业现实出发建立的范畴和观念对它们进行分析。这种在知识体系上对农民的虚无化很值得细致分析，以便向人们揭示它是如何产生的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 * *

在上个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为了使人们既能保持古老的乡村价值，又能体验进步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冒险生活，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出各

① 柯布莱，1965年。

② 柴雅诺夫，1924年。

种和谐社会和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者注），那儿的时间和劳动在田野和工厂之间分配，人类将会在和谐地发挥自己的各种才能中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所有的人都认为，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农民应当养活城市，并像供给步兵营那样供给工业营的富佬。

运动、革命和进步都在别处发生：在城市里，它们吸引着所有期望变化的人们。在19世纪，人们从这种对比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农业从来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农业劳动者始终遵守着田野的永恒秩序。

一个世纪以前，当制作业还处于手工阶段时，农业就发生了革命，农民动荡不安，并准备烧毁城堡，对农业和农民的这种写照大概会令人非常惊奇。农业的改进曾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务^①。在法国，国王做出表率，贵族大人物则追随其后，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农业社会”^②，探索说服农民的最佳方法。1788年，R·德·拉贝吉利发表了《对阻碍农业进步的主要流弊的研究》，其论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A·荣格面对某些地区的原始农业发出的愤慨“诅咒”和他访问一些美好领地的“欢悦”也表明了当时的进步所具有的规模。^③

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像英国人那样，想圈地养羊。但是，由于没有公共牧场而无法饲养牲畜的散工以及小农反对这种个人主义的财产专有形式，他们“为土地私有化而进

① 奥吉-拉里贝，1955年。

② 朱斯坦，1935年。

③ 荣格，1789年。

行的斗争”使整个王国动荡不安，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平衡^①。

大多数法国农业史学家都庆幸“法国的明智”，由于这种明智，我们的国家避免了18世纪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极端社会后果，从而能够保留下众多的农民，而英国人，由于他们向工业经济的逻辑让步，为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是在行进路上停顿下来，它停歇了1个半世纪，在缓慢接受技术新潮的同时，它的农民仍然是“农民”。

今天，第二次农业革命震撼了一切结构，明智的平衡被打破了。轮到农业自身“工业化”了，延迟了150年之后，法国农民被人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所扼杀。我们突然感到十分接近18世纪，我们重新发现，自然会被技术所驯服，土地的历史是由不断的进步、革新和改进所组成的，农业劳动者都是不安分的。然而，从本质上说，我们仍然停留在19世纪遗留给我们的观念之中，而这些观念显然都已过时了。

对于驱使全世界农业社会投入更新技术和重建社会平衡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们不想依然是那样麻木不仁和视而不见，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正我们的观念，以新的眼光看待农村。农民在工业化最快的国家中的消失，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勿宁说是由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

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②，农业完全服从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但农业仍是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过分地牵扯着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精力。

在法国，一个恰当的著名例子就是完全按照工人联合会

① 布洛克，1930年。

② 贝内迪柯特，1955年。

的意图制定的1884年工会法案，这个法案之所以被扩展到农业，是因为一个参议员在会议结束时想起建议在法案的陈述中加上“以及农业”一句。由于这最后时刻添加的一句话，整个农业联合会运动才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并担负起立法者未曾预料到的重要经济职能。今天，人们仍可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向农业领域的扩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具有某种意义并对所有受薪者都似乎公平合理的立法，对农业经营者却像是一种施舍，不能解决他们的真实问题。最后，如果说法国自一个世纪以来没有真正的“农业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构思这种政策的知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与他们的“资本主义”同事感到同样的无能为力^①：尽管他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公社、合作社和农业城，他们总是与他们的农民存在争执，农业是他们的经济的薄弱点。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马克思曾显露出对农民缺乏了解，但从这一点来寻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会走向极端呢？

不论是波兰和南斯拉夫，还是印度和古巴，都还没有为人们所说的不发达国家找到出路^②。中国的经验是迷人的，但它的成功并没有把握。以色列的杰出成就由于其独特性而无法模仿。难道仅仅是由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与传统农民社会的逻辑不相容？期望把前者应用于后者显然只能导致对后者的破坏。

* * *

今天，工业社会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了^③。那么“农民

① 依齐比，1963年。

② 奥吉-拉里贝，1950年。

③ 阿隆，1962年。

社会”还意味着什么呢？农民社会^①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总体社会中相对自治的整体。如果一个土地社会完全是自治的，在功能上并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社会的组成部分，那我们是在谈论“蒙昧”社会，我们是在18世纪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似乎比目前的那些术语更为适当（原始的、古代的、没有文字的、没有历史的，等等）。而如果乡村集体相对于包罗一切的社会来说不享有相对的自治，那我们是在谈论农业生产者、地方群体，也可能是乡村“阶级”，但不是农民整体。一言以蔽之，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

农民社会可细分成地方社区^②，这种社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相对来说自成一体。根据马克思的著名描述^③，上个世纪的法国农民像“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整体，所有社区都属于同一类别，但每个社区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④。

每个社区都是一个互识的群体^⑤，其中每个人都认识所有的人和他人所有特点，社会关系是人格化的、非功能性的和分割成部分的。社区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业耕作者、牲畜饲养者、土地所有者、经营者或受薪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和非农民（显要人士、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等）结合在一起，但社会主调是由农民决定的。权力一般属于那些处于地方社区和

① R·莱德弗尔德，1956年；托尔耐，1964年。

② R·莱德弗尔德，1955年。

③ 马克思，1852年。

④ 阿兰斯保，1961年。

⑤ 马热，1955年。

总体社会之间的边缘地位的显要人士。最重要的分层常常是在依照社会经济的威望来确定的等级方面。除此之外，分层也可以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生态方面或广义上的家庭方面的，亲族和主顾经常是混同的。最后，年龄和性别的范畴一般都是非常个性化了的。

在这些结构非常牢固的社区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地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这些社区并没有僵化凝固，但除非有严重的危机，否则他们只能按照世代交替的节奏缓慢进化。所有的革新，不论是技术的、经济的、还是人口的，都来自外部。A·多扎几乎毫不怀疑在这方面存有的偏见，他断言“乡村什么也不创造，它的一切都来自城市，服装、习俗、歌曲”……人们还可加上机器和技术^①。

在这样一个社会体系中，个人不需要去适应新的境况或作出什么决定，也不需要向其他了解自己全部特性的人去表白和公开什么。于是，他会一成不变，保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价值和规范的准则都不鼓励个人感情和观点的显示与表露。

自中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这种典型的传统农民社会在西欧以不同形式呈现。今天，它仍然还是一种解释模式，有助于理解乡村社区在彻底的改造中的运行逻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只剩下些遗迹，由于风蚀磨损过重，以致在一些根本相异的结构中无法再理解这些遗迹的意义。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个模式可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它的某些成分可以作为有用的解释工具，但是，如果把它视为

① 奥吉-拉里贝，1955年，导论和第147页；多扎，1941年，第130页。

一种普遍的模式，认为它可以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社会中的所有农业社区，那将是很危险的。为了建立类似的模式，必须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然后人们才能够弄清楚是否存在着一一般农民共有的唯一理想典型，以及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属类中，变化多样的欧洲农民是否仅仅是诸多种类中的一种。

二

蒸汽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它的逻辑强加给工业的，并继而将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①。蒸汽机是固定的能源，所以所有的机器都必须集结在同一个厂房里，共同使用，从而使劳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和等级权威。但土地是不可移动的承载物，相对劳动资料（谷物、耕地……）来说机器是活动的，因此这里不像在工厂里，那儿情况完全相反。生物的自然机制有自己的节奏，尽管有时可以加速，但不会有根本的变动。空间和时间是田野劳动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蒸汽机在这儿不会一路凯旋。几经试验之后，蒸汽拖拉机被抛弃了^②，由于这一失败，与一切等级权威不相干的农业经营者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劳动和时间的主人。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与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今天，农业较迟地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已经逃避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等待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会发生很多自然机制的原子革命。借助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内燃机使机器作用于固定的劳动资料上，从而战胜了空间的约

① 贝尔，1956年。

② 福舍，1954年，第82～88页。